

## 敦煌遺書中所見敦煌與外地之文本流通

郝春文（首都師範大學）

武紹衛（浙江師範大學）

**摘要：**敦煌是東西經濟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中保存了為數不少的直接從外地傳入敦煌的文書。這些“外來文本”是敦煌與外地文化交流的載體，其中一些是中華文化與域外文明彙聚交融的結果，也是東西文化融入敦煌、影響敦煌人的歷史見證。將這些文本統一搜集和整理，分析其時空分佈及其演變，並對其內容及輸入的方式試作探討，可以使我們對敦煌與外地之間文本的流通有更為完整和深入的認知。

**關鍵詞：**敦煌、外來文本、交流

作為“華戎交匯一都市”的敦煌，不僅是東西經濟貿易的中轉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匯點。敦煌藏經洞的遺書既有東來西往外地人遺留下的書卷，也有敦煌人東去西行攜帶回的寫本。這些“外來文本”是敦煌與外地文化交流的載體，其中一些是中華文化與域外文明彙聚交融的結果，也是東西文化融入敦煌、影響敦煌人的歷史見證。

關於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早在1939年許國霖就在藏經洞文獻中檢出6件來自南朝的典籍，而陳寅恪在此基礎上初步嘗試對南朝寫經流入敦煌的途徑作出解釋，<sup>1</sup>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敦煌的外來文本，並以此討論敦煌與外地的文化交流。但學者多是就敦煌在某時段或與某地之間的文本交流進行探討，尤以對敦煌與長安、四川、西藏等地的交往關注為多，<sup>2</sup>而缺少對敦煌遺書中外來文本的整體統計與把握。本文則嘗試對這些文本做統一搜集和整理，分析其時空分佈及其演變，並對其內容及輸入的方式試作探討，希望能對從整體上把握這批文獻與敦煌關係有所幫助。

---

<sup>1</sup> 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初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9年，此據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27-233頁。

<sup>2</sup> 陳祚龍《中世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敦煌學散策之一》，收錄於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敦煌學》第一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出版，1974年，第79-86頁；王書慶、楊富學《唐代長安與敦煌佛教文化之關係》，收錄於王書慶、楊富學編《敦煌佛教與禪宗研究論集》，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20-138頁；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談起》，《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15-25頁；等等。

## 一、基本材料

經我們粗略的搜集、統計，敦煌遺書中現存的外來文本有近兩百件，列表如下（表1）：

表1 敦煌遺書現存外來文書統計表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410	京博 186	大般涅槃經疏	建康?
418	羽 630	法華經卷六	長安
421	SCM. D. 115189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建康?
455	S. 2925V	辯意經	伊吾
471	P. 4506	金光明經	定州中山郡
471	書道博物館 11	勝鬘經	建康
479	S. 996	雜阿毗曇心論	洛州（洛陽）
483	中村不折 173 一卷之 4	觀普賢經	建康（南京）
492	京博 187	大方等大集經卷一二	建康?
497	敦研 323	金剛經	吳郡
500	S. 2106	維摩義記	定州豐樂寺
504	羽 430	大般涅槃義記	司州
505	中村不折 15	大般涅槃經卷四〇	涼州
506	S. 81	大涅槃經	荊州
508	S. 2733	法華義記	洛陽
515	S. 524	勝鬘經疏	長安或高昌
519	P. 2196	出家人受菩薩戒法	建康
523	羽 757	華嚴經卷六〇	建康
537	P. 2189	東都發願文	洛陽
559	中村不折 49	法華經卷三	高昌丁谷窟
559	羽 758	法華經卷一	西梁（荊州）
576	P. 2965	生經	江陵
581	P. 5596	佛名經	伊吾
586	P. 2160	摩訶摩耶經卷上	建康?
588	S. 4020	思益經	襄州
589	S. 2154	佛說甚深大回向經	長安
589	P. 2413	大樓炭經卷三	長安
589	津藝 021(60-5-1696)	大樓炭經卷六	長安
589	浙 29	太子慕魄經	長安
589	羽 763	大般涅槃經卷一六、一七	長安
589	上博 57(44962)	持世經	長安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589	京都博物館 209	月燈三昧經	長安
601	S. 2048	攝論章	長安
602	S. 3548	中阿含經	長安(大興善寺)
603	羽 759	增壹阿含經卷五	長安(?)
608	羽 621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 本	長安?
612	S. 2295	老子變化經	長安
616	中村不折 59	僧伽吒經	長安
618	上圖 21 (812399)	法華經卷六	高昌
630	BD 6836 (羽 36)	四分律	長安
637	S. 2838	維摩詰經卷下	高昌
637	S. 409	金光明經卷一	高昌
639	S. 3888	大方等如來藏經	高昌
653	P. 4508	唐太宗書溫泉銘拓本	京兆府圍谷府
662	P. 2056	阿毗曇毗婆沙論	鄠縣
663	P. 2090	法華經卷七	雍州
664	P. 3233	《洞淵神咒經》卷一	長安
664	P. 2444	《洞淵神咒經》卷七	長安
671	S. 5319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1	S.3079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1	S.084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2	S. 36	金剛經	長安
672	敦博 55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2	高博 001	金剛經	長安
672	津藝 002 (57-5-17)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2	羽 12	金剛經	長安
672	P.4556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2	P.2644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2	S.4209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2	S.4551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3	慕尼克個人藏	金剛經	長安
673	BD 14422 (新 622)	金剛經	長安
673	BD 14490 (新 690)	金剛經	長安
673	S.2573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3	S.0312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4	上圖 32 (812438)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4	S. 456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4	S. 3348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4	Дx. 4930	法華經卷二或卷六	長安
675	上博 30 (36642)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5	羽 6	法華經卷四	長安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675	中村不折 70	金剛經	長安
675	三井八郎右衛門藏卷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5	京都博物館藏卷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5	P.2195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6	上博 53 ( 44958 )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6	羽 9	法華經卷六	長安
676	羽 45	法華經卷四	長安
676	羽 46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 513	金剛經	長安
676	P.3278	金剛經	長安
676	S.3361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6	S.4353	法華經卷一	長安
676	S.2181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6	S.2637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4168	法華經卷三	長安
676	S.1456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S.1048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BD14437 ( 新 0637 )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6	三井八郎 右衛門藏卷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6	S.2956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6	Дx. 160	法華經卷七	長安
677	羽 7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77	S.3094	法華經卷二	長安
677	上博 018 ( 3322 )	法華經卷五	長安
690	EO.1208	武周載初元年令狐懷寂告 身	長安
695	中村不折 173 二卷之 5	觀世音經	甘州
695	羽 10	法華經卷一	洛州
695	羽 554	法華經卷七	洛州
695	BD 13829 ( 新 29 )	法華經卷五	成州同谷
699	P. 3749V	聖曆二年 ( 699 ) 汜承儼 昭武校尉行左衛涇州肅清 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上柱 國告身	涇州
700	S. 87	金剛經	大斗拔谷
700	甘博 29	大般涅槃經後分	晉州安信府
707	上圖 26 ( 812404 )	金剛經	成州同谷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708	書道博物館藏 (不知編號) <sup>3</sup>	大般涅槃經卷七	成州同谷
708	BD 14949	大般涅槃經卷五	成州同谷
708	藤井有鄰館	大般涅槃經卷九	成州同谷
708	S. 2136	大般涅槃經卷十	成州同谷
708	BD 2602 (律 2)	金剛經	金城鎮
709	S. 11453G-L	唐瀚海軍典抄牒狀文事目 曆	北庭瀚海軍
711	S. 11287Q	敕沙州刺史能昌仁牒	長安
711	敦研 341	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	長安
712	天理圖書館	景雲三年張君義敕牒	長安
719	P. 2819	開元公式令	涼州
721	S. 8877	唐開元九年長行坊牒	北庭
721	S. 8515	唐開元年間長行坊牒	北庭
721	S. 11450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沘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1	S. 11451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沘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1	S. 11452	開元九年 721 十一月史沘 迪牒為長行坊給馬及馬料 事並判	北庭
727	BD 3339 (雨 39)	金光明最勝王經	北庭
735	P. 2163	諸經要集	幽州
735	Дx. 3820V+Дx. 3851V, Дx. 11086V	張掖縣戶籍	張掖
735	P. 3725	道德經	長安
735	P. 2457	閱紫錄儀	洛陽
736	P. 2979	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 判集	岐州郿縣
738	P. 2617	周易經典釋文	晉州

<sup>3</sup> 該件未收錄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但台灣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張明菜於其碩士論文中稱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收藏有薛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七，論文附圖版一張，為卷末寫經題記。參張明菜《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之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此據方廣錫先生博客介紹：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3c23f390102xzi7.html?md=gd](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3c23f390102xzi7.html?md=gd)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741	P. 2547	開元廿九年張懷欽等勳官 騎都尉告身	長安
755	S. 3392	天寶十四載三月十七日騎 都尉秦元告身	長安
755	P. 3307Vb	敕韋見素牒	長安
756	羽 71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 事	洛陽
759	羽 502	法華經卷三	甯州彭池府
764	P. 2041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下	西州南平城西裴家 塔
765	P. 2942	瓜沙甘肅等州公文集	瓜州 - 沙州 - 甘 州 - 肅州
774	BD 471 ( 洪 71 )	法華經卷六	長安
774	羽 557	法華經卷四	長安 ( ? )
隋唐前期	S. 1415	律藏第四分	長安 ( 大興善寺 )
隋唐前期	S. 11459C-H	唐瀚海軍典抄牒狀文事目 曆	瀚海軍
隋唐前期	P. 4510	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拓本	長安
隋唐前期	S. 5791	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拓本	長安
788	S. 3475	淨名經關中疏	號州
798	BD2092 ( 冬 92 )	四分律抄	肅州酒泉
824	P. 4503	金剛經拓本	長安
842	BD2315 ( 餘 15 )	諸星母陀羅尼	甘州
846	P. 2073	薩婆多宗五事論	甘州張掖
吐蕃統治時 期	BD1048V ( 辰 48V )	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	甘州
吐蕃統治時 期	GL. T. 314 ( 甘肅藏敦 煌藏文文獻 )	大般若經	甘州
863	甘博 018	金剛經	長安
871 年之前	P. 3750	甘州某官給子信	甘州
880	S. 4397	觀世音經	吐蕃
884	S. 389	肅州防戍都狀	肅州
884	S.2589	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肅州 防戍都狀	肅州
890	P. 2555p1	歸義軍留後信封筒	甘州、涼州 ( ? )
893	P. 3711	大順四年正月日瓜州營田 使狀	甘州
893	S. 526	武威郡夫人陰氏與某和尚 書	肅州或甘州 ( ? )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888-904	S. 8444	唐昭宗某年內文思院為甘州回鶻貢品回賜會計曆	長安
905	BD 4074 (麗 74)	回向輪經	瓜州
918	S. 4378V	大悲啟請、佛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	江陵府
923	P. 3936	甘州丈人給沙州女婿信	甘州
924	S. 5981	鄜州開元寺智嚴往西天巡禮聖跡	鄜州
924	S. 529	歸文牒	定州
923-926	S. 2659V	大唐西域記	鄜州
927	羽 2	維摩義記	渤海國
934	S. 76V	牒狀、文人詩集	茶陵縣
942	S. 4437V (2)	將仕郎前守滄州南皮縣令王謙上侍郎啟	滄州南皮(?)
947	P. 2292b	維摩詰經講經文	西川
954	S. 2241A	瓜州水官王安德狀	瓜州
957	P. 2374	延壽命經、續命經、天請問經	瓜州
958	S. 196	左街賜紫洪范大師牒	會稽
958	BD2062 (冬 62)	維摩詰經	西川
961	S. 6264	八關戒牒	于闐
961	P. 2893	報恩經卷四	于闐
964	P. 4518 (2) V	天壽二年寶勝狀	于闐
970	P. 5538	于闐王尉遲輸羅天尊四年致沙洲大王舅曹元忠書	于闐
971	P. 2943	開寶四年瓜州衙推汜願長與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燈狀	瓜州
981	Φ 181	太平興國六年法進於澄淨師受戒文	真定府
989	S. 3424V	志堅狀	靈州(?)
甘州回鶻時期	S. 11297	侄惠藏上肅州宰相娘子狀封啟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 2889	須摩提長者經	于闐
歸義軍時代	P. 4610	丈人劉某與女婿李郎書	邠州
歸義軍時代	P. O. 13	禮佛文	龜茲?
歸義軍時代	S. 3885	大般涅槃經卷一六	涼州
歸義軍時代	俄藏黑水城 B13	志堅狀	靈州(?)
歸義軍時代	Or. 8212-180	侄子庫爾·達幹·伯克與庫文法師信	沙州附近某地
歸義軍時代	P. 5012	肅州智藏上淨土寺李僧正信封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O.6	肅州某與沙州諸友信	肅州

時間	卷號	定名	來源地
歸義軍時代	Or8212-120	肅州某商人與沙州弟依斯 哈克等人信	肅州
歸義軍時代	P. 4518	賜惠清賜紫牒	長安
歸義軍時代	P. O. 15	某商人從仲雲寫給甘州諸 親信	仲雲或甘州
歸義軍時代	Or. 8212-179	老漢刺史與葉勒·阿勒迷 失達幹信	仲雲或甘州

首先應該說明，以上近兩百件文本並非敦煌外來文本的全部，這不但是因為我們的統計肯定會有疏漏甚至錯誤，更重要的是敦煌遺書並非當時在敦煌地區流通的文本的全部，只是敦煌僧團偶然保存下來的部分文本。所以，我們利用這些資料對敦煌外來文本所做的分析只具有參考意義，不是嚴格的量化研究。

其次，以上所列都是依據其內容和題記可以確定其來自敦煌以外的文本。如所周知，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儒、釋、道典籍，絕大部分應該都是由內地傳入的。但因這類典籍很多沒有題記，所以我們無法確認其到底是抄於敦煌還是抄於敦煌以外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只能依據題記判斷其歸屬。即凡是題記標明抄寫於敦煌以外地區的我們才列入上表。當然，這樣處理可能會遺漏一部分實際從外地流入但沒有題記的典籍。但目前似乎只能這樣處理。

此外，有一些寫本在題記中並沒有標示其具體地點，不過其所標年號為某一地方性政權所用時，也可以幫助我們大致確認其來源地。如羽 785《法華經卷一》題記“大定五年六月弟子王光為父母供養經”，使用“大定”年號者有西梁宣帝（555-562年）、北周靜帝（581）、金世宗（1161-1189年）、陳友諒（1361-1363年）；但該件寫經書法楷中帶隸，應是南北朝隋朝之寫卷，故暫將“大定五年”定為西梁年號。

還有一些寫卷，我們只能確認其大概書寫區域，無法將其系於某個具體地點。此時則採取兩個原則：一是行政中心原則：國系於都，州郡系於治所。如上舉羽 785，因為我們無法確認該件具體的抄寫地點，故而在統計此件時，暫將其擬標在西梁都城江陵（今荊州）。二是如標有具體官員姓名或寺院名，則系於史籍僧傳等史料所記載該區域所見官員具體任職地點或同名寺院，如 S. 4020《思益經》題記“大隋開皇八年（589）歲次戊申四月八日秦王妃崔為法界眾生敬造《雜阿含》等經五百卷，流通供養”，此經為秦王妃敬造，故抄寫地點當與秦王有直接關係。按 589 年隋朝秦王為楊俊，其治所在襄州，故將此件系於襄州。又如羽 759《增壹阿含經》題記“仁壽三年（603）八月弟子皇太子廣為法界眾生敬造一切經流通供養”，在標注地點時則依皇太子身份，將其系於長安。再如 P. 2965《生經》題記“陳太建八年（576）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經藏”顯示該寫經寫於陳朝統治下的某白馬寺，但並未標明具體的地點，根據《高僧傳·曇毅傳》江陵有白馬寺，故將此件系於江陵。

## 二、敦煌外來文本的時空分佈

依據上列材料，可以對敦煌外來文本的時空分佈製成下圖（圖 1）：

從上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時間段，敦煌外來文本來源的空間分佈是有變化的。

南北朝時期，雖然樣本不多，但可以看出（圖 2），其來源是分散的，包括建康、長安、伊吾、定州、洛州、吳郡、司州、涼州、荊州、高昌等地。但南朝的都城建康還是相對影響要大一些，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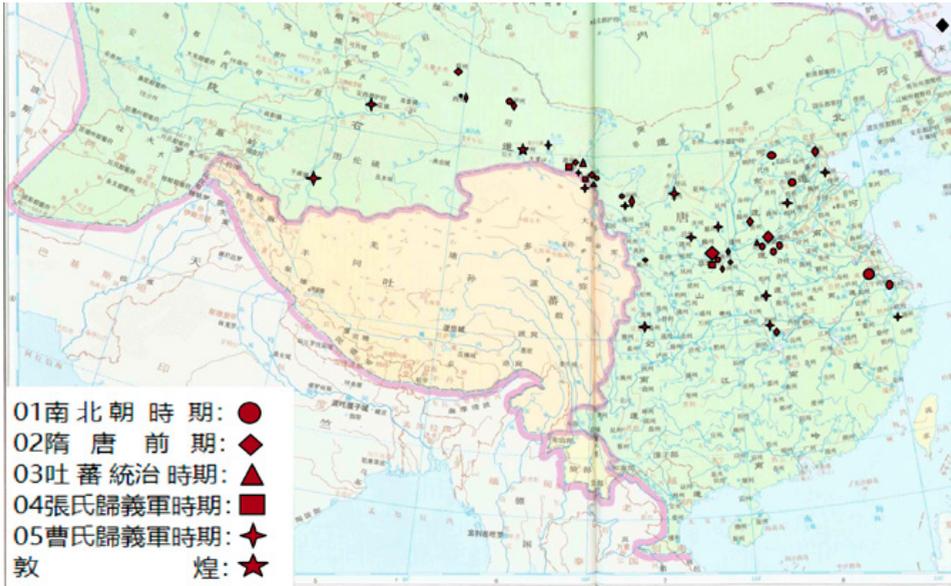


圖 1 敦煌遺書中外來文本時空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唐時期全圖(一)》<sup>4</sup>為底本繪製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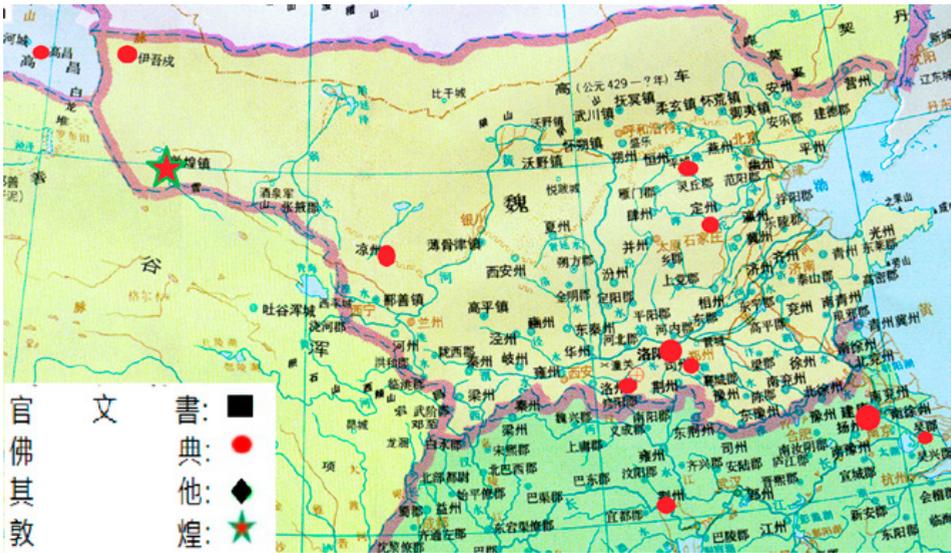


圖 2 南北朝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齊魏時期全圖》<sup>5</sup>為底本繪製而成)

<sup>4</sup>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2)《唐時期圖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32-33頁。

<sup>5</sup>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4冊(2)《南北朝時期圖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19-2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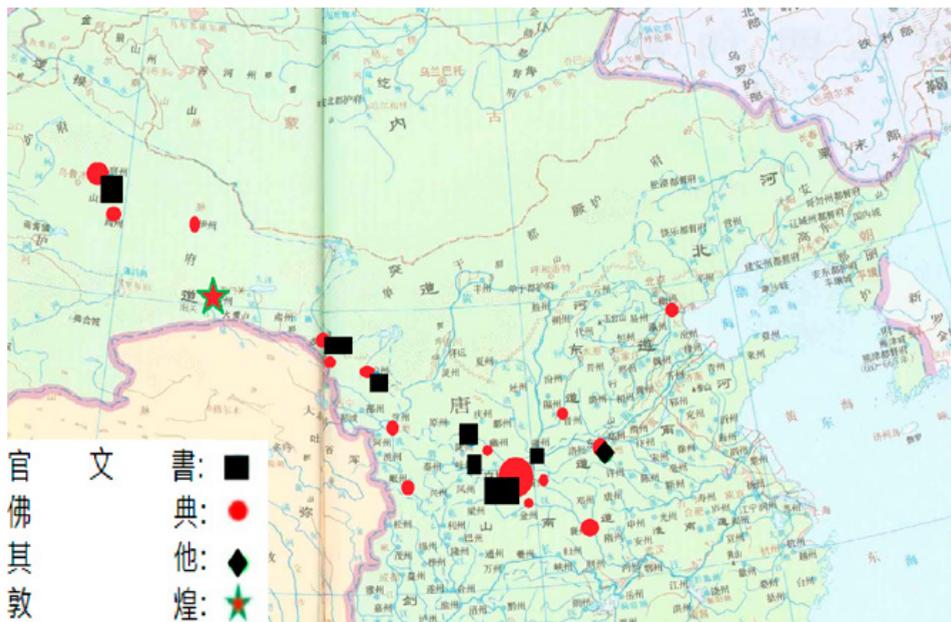


圖3 隋唐前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1）

該地的文本占敦煌外來文本三分之一強。說明南北朝時期，南朝文化的影響或輻射力要遠遠大於北朝。這也說明在南北朝時期，雖然北朝的軍事、經濟方面佔有優勢，但在文化方面的影響還是不能和南朝相比。但這一階段畢竟處於分裂時代，南朝都城對敦煌的影響力尚不能和其後大一統時代的隋與唐前期的都城相比。

這一時期，來自伊吾和高昌的寫經各一件。雖然件數很少，但說明這一時期敦煌還是可以得到從西邊流傳過來的經本的。

隋與唐前期，是敦煌外來文本保存最多的時期，其數量和分佈區域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圖3）。但來自都城長安的文本佔據了絕對優勢，占總數的一半還多。在這一時期的文本中，雖然佛典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但官文書數量明顯增多。這些官文書反映了大一統時期都城對地方的直接管理和控制。當然，這一時期來自長安的佛典也是都城對地方佛教實施影響和輻射的載體。

敦煌與長安的交通，最便利的通道是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的重要據點，如涼州、甘州、肅州等在這一時期均有寫本傳至敦煌。連接河西走廊與長安的交通要道主要有兩條：一是長安向西過岐州、隴州、蘭州，經涼州、甘州、肅州，以至敦煌（以下稱西道）；二是由長安向西北過邠州、慶州、涇州、靈州，經涼州、甘州、肅州以至敦煌（以下稱西北道）。唐前期的外來寫本中有來自岐州（P. 2979）、蘭州（BD 2602 [律 2]）等西道沿線諸州的寫本，也有來自寧州（羽 502）、涇州（P. 3749）等西北道沿線諸州的寫本，數量相埒，可見當時西道和西北道都是敦煌與中原交流的主要交通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一時期都城對敦煌的影響處於絕對支配地位，但來自敦煌以西地區的文本也還是具有相當的數量。反映了絲路的通暢和對文化交流的影響。而且，敦煌以西的絲路南道、中道和北道三道沿線地區的寫本都有傳入敦煌。但在數量上仍以北道居多。並且，南道寫本都來自于闐、中道寫本都來自龜茲，來源相對單一；而北道則有來自庭州、西州、伊州等多地的寫本。反映了在唐王朝直接控制下的絲路北道與敦煌實際存在更頻繁的交流，包括文本交流。

從整體上看，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隋與唐前期的外來文本充分顯示出敦煌在東西交流中處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

吐蕃管轄敦煌時期（公元 786 至 848 年），由於吐蕃與唐王朝處於敵對狀態，所以敦煌與中原王朝的聯繫基本斷絕。隴右、河西以及今新疆地區都在吐蕃控制之下，按理說敦煌與這些地區的聯繫應該是暢通的。但在吐蕃管轄敦煌的 60 多年，保存下來的外來文本數量很少（圖 4），而且大部分來自河西的甘州和肅州，敦煌以西地區的文本一件也沒有發現。說明這一時期敦煌與新疆地區的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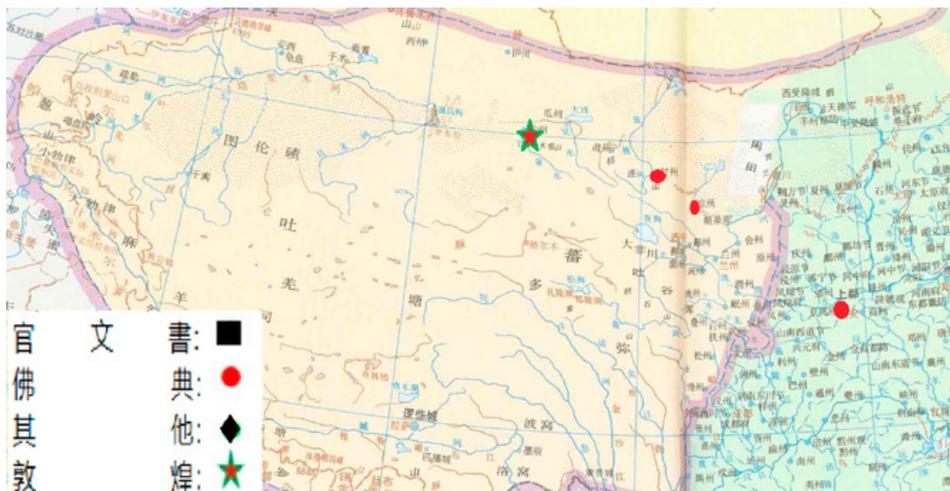


圖 4 吐蕃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以《唐時期全圖(三)》<sup>6</sup>為底本繪製而成)

雖然沒有中斷，但文化交流實際上中斷了，與河西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也很少。

張氏歸義軍(848-914年)雖名義上是中原王朝的藩鎮，但經常受到回鶻勢力的侵擾，通往中原王朝和西域的道路更是經常被回鶻政權阻斷。與吐蕃時期相比，歸義軍與中原和西域的聯繫沒有大的改善。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這一時期的外來文本數量仍然有限(圖5)，而且仍然是主要來自河西地區。所保存的文本以書信、狀居多，佛典很少，且均為小部頭佛經。說明這一時期敦煌與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仍然很少。

與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相比，曹氏歸義軍時期(914-1036年)外來文本不僅數量有所增加，來源分佈也更加廣泛。內地有江陵、茶陵、會稽、鄜州、真定府、滄州和西川，敦煌以西則有龜茲和于闐，

<sup>6</sup> 該分佈圖底本採自前揭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2)《唐時期圖組》，第36-3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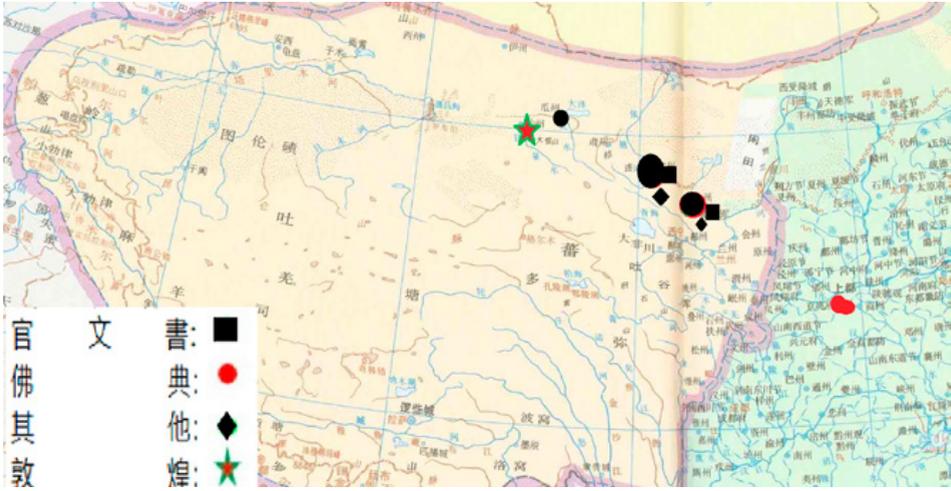


圖 5 張氏歸義軍時期外來文本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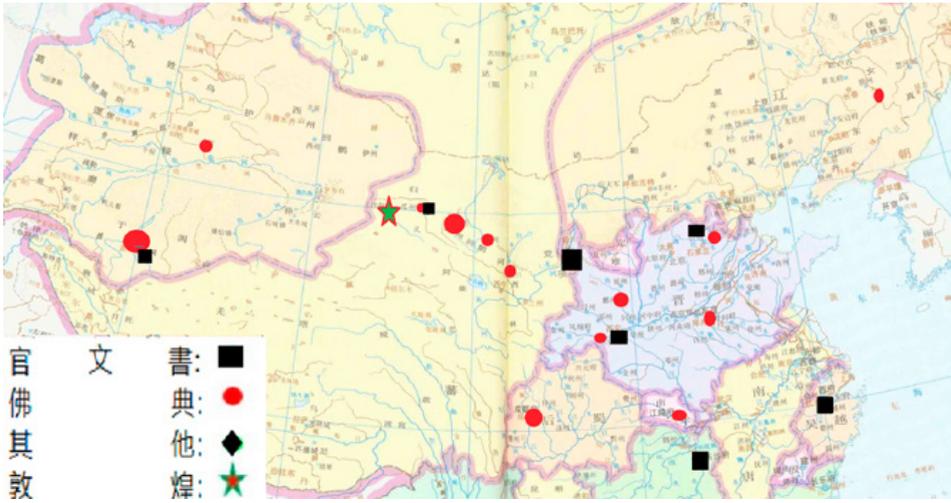


圖 6 曹氏歸義軍時期外來文本空間分佈圖（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當然也有來自河西的甘州和瓜州的文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寫本中，有來自遼朝東丹國的羽 2《維摩義記》<sup>7</sup>，說明這一時期敦煌與遼朝也有文化交流。這都表明曹氏歸義軍時期與外界的文化交流較吐蕃、張氏歸義軍時期加強了。

與唐前期不同，這一時期外來文本中只有西北道沿線諸州寫本傳至敦煌（靈州，S. 3424V、俄藏黑水城 B13 等；邠州，P. 4610），而無西道沿線諸州的文本，似乎表明這一時期由於經由蘭州、涼州的西道道路阻隔，敦煌通中原多走經由靈州的西北道。

這一時期來自敦煌以西的文本，與南北朝、隋與唐前期的分佈亦相差較大，南北朝、隋與唐前期敦煌以西的文本多來自絲路北道，但這一時期未見來自北道的文本，而來自南道的寫本，以于闐地區的文本數量最多，也有來自中道龜茲的寫本，只不過數量較少。來自于闐的文本較多，與曹氏歸義軍首領和于闐王聯姻有關，故而兩地交流頻繁。

以上對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外來文本的統計表明，南北朝時期敦煌與內地文本交流的地點是廣泛的，與其西邊的絲路北道也有文本流通。隋與唐前期，是敦煌與東西兩個方向文本交流最頻繁的時期，都城長安的文本佔據主導和支配地位。吐蕃和張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幾乎陷於停頓。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雖有所恢復，但交流的頻度和範圍均無法和隋唐時期相比。

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文化的逐漸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與外界文化交流的減少和停頓，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

<sup>7</sup> 鄭阿財先生認為此年號為後人偽造，但未提出堅實證據。參鄭阿財《敦煌本〈維摩義記〉抄寫年代及系統分析》，《佛光學報》新三卷·第二期，2017年，第1-40頁等。



圖 7 南北朝時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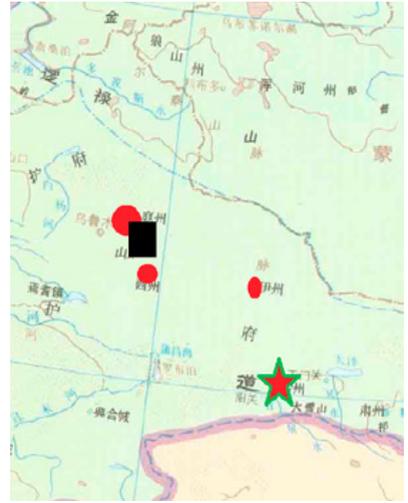


圖 8 隋與唐前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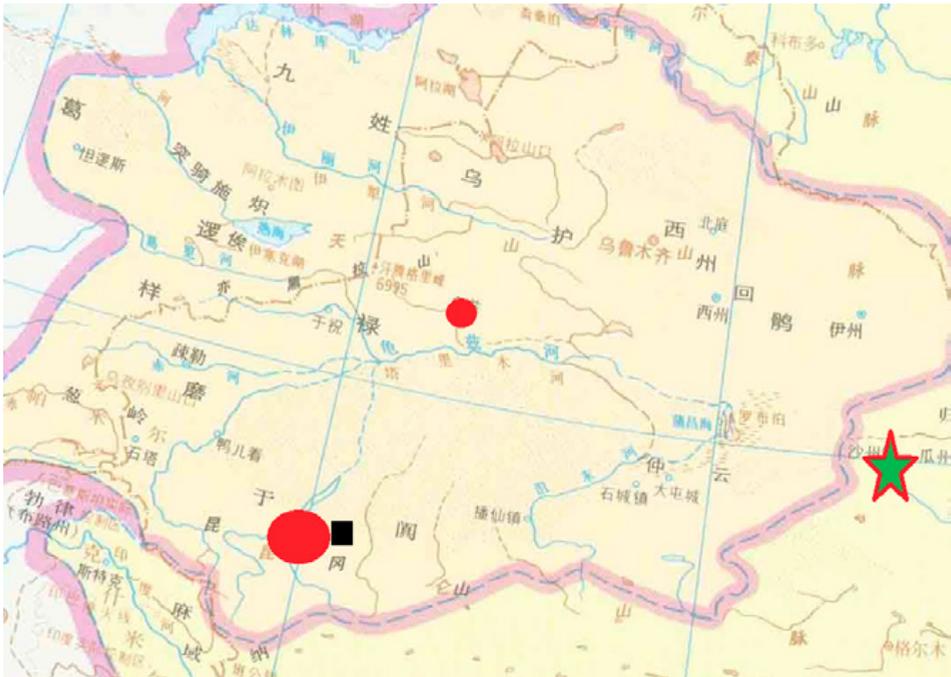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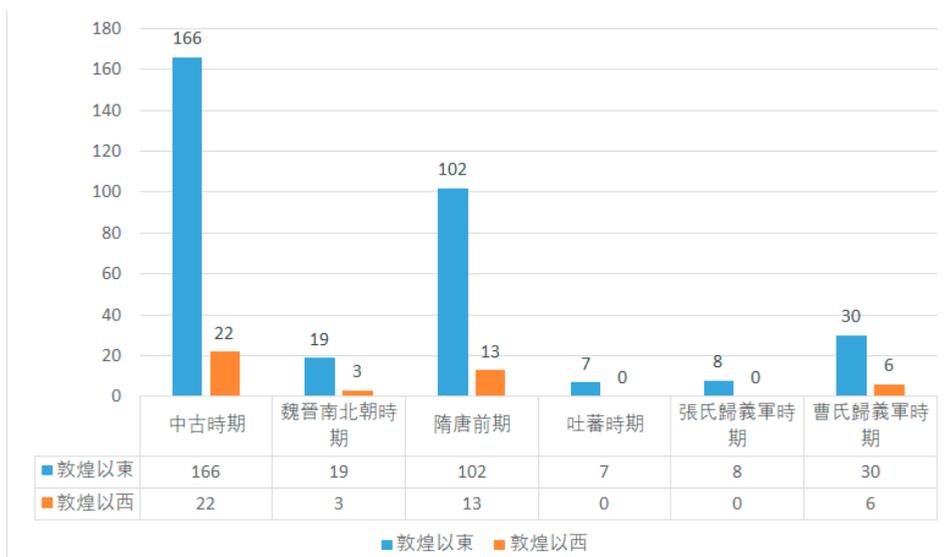


圖 9 曹氏歸義軍時期西域寫本空間分佈圖 (該分佈圖底本來源同圖 4)

不同時期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的時空分佈雖然不斷變化，但以上資料表明，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是以與內地交流為主，與其以西地區的交流為輔（表 2）。

表 2 敦煌遺書中所見東來、西來文本對比



以上統計對理解和分析敦煌文化的特質是有幫助的。

### 三、外來文本的內容和傳入方式

就內容而言，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外來文本可分為典籍和文書兩類，典籍是以佛教經典居多，文書可分為官府文書和私人文書。其傳入方式可分為官府輸入和私人攜入兩種。

官府輸入典籍的方式是頒賜經典。種種跡象表明，隋唐時期地方州（郡）縣的儒家、佛教和道教典籍，都應該是由中央政府組織繕寫定本，分送地方抄寫，或者直接將宮廷繕寫的定本頒賜給地方。

如道經向地方傳播的方式，唐玄宗天寶七年（748）詔規定：

今內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sup>8</sup>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來自隋唐宮廷的道經典籍有隋煬帝時寫經（S. 2295《老子變化經》（612）、唐高宗武后寫經（P. 3233《太上洞淵神咒經·誓魔品第一》[664]、P. 2444《洞淵神咒經卷七》[664]）、唐玄宗寫經（P. 3725《道德經卷上》[735]和P. 2457《閱紫錄儀》[735]）。其中，高宗武后時期寫經，是為太子李弘祈福；玄宗寫經則是為玄宗個人祈福。這些宮廷寫經都有題記，應該不是地方轉寫的文本，而是宮廷直接頒賜給敦煌道觀的。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隋唐宮廷所寫佛經，也應該是由宮廷直接頒賜給敦煌寺院。據《廣弘明集》、《續高僧傳》記載，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文帝曾下詔，於三十州分舍利，要求於十月十五日正午同時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sup>9</sup>敦煌便在其列。根據記載，舍利塔即位於崇教寺。有學者認為此塔即S. 3929+S. 3937《董保德功德記》所記“普淨塔”。<sup>10</sup>以上《廣弘明集》、《續高僧傳》的記載雖然不是頒賜佛經，但能夠獲得分舍利資格的地方寺院明顯少於獲得宮廷寫經的寺院。因為據武則天禦制《金剛經》和《法華經》之序，

<sup>8</sup>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五四，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568頁。

<sup>9</sup> 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舍利感應記》，《大正藏》編號2103，第52冊，第213頁中欄第26行至第216頁中欄18行。

<sup>10</sup> 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記〉與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83頁。

這兩部經典都是“奉為二親”“敬造三千部”<sup>11</sup>，全國各地的官寺大多應該有機會得到。敦煌地區的官寺，唐後期時有 17 所<sup>12</sup>，隋與唐前期應該不少於 10 所。以每所官寺獲得一部計算，武則天寫的這兩部經，敦煌至少可以獲得 10 部。而敦煌遺書中現存《金剛經》宮廷寫經 12 部，《法華經》各卷少者 2 份，多者 9 份。這兩部經一共保存了 50 多件<sup>13</sup>。

唐代宮廷的抄經行為，特別是武則天的抄經行為，既是宗教行為，也是政治宣傳。這些宮廷寫經及時頒賜到敦煌，當然不僅僅具有宗教意義，實際上也是唐王朝對地方行使意識形態統治權的具體表現。

隋代的宮廷寫經已被學界確認的有獨孤皇后所寫之 S. 2154《甚深大回向經》、P. 2413《大樓炭經卷三》、津藝 021 (60-5-1696)《大樓炭經卷六》、浙 29《太子慕魄經》、上博 57 (44962)《持世經》、京都博物館藏《月燈三昧經》<sup>14</sup>。此外，近年刊佈的杏雨書屋藏敦煌

<sup>11</sup> 見 S.7236、S.5710、高博 001；P.3788、P.4621 等。

<sup>12</sup> 見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1988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0-85 頁。

<sup>13</sup> 趙和平先生於 2010 年發表的文章中曾統計了 55 號咸亨至儀鳳年間的宮廷寫經，其後又搜集到 Dx. 11013 和 Dx. 11014，共計 57 號。但在文章中，高博 1、S. 513、P. 3278、羽 45（李盛鐸舊藏（散 0195））重複統計了兩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武則天制〈法華經〉序》、S.7236、P. 3788 俱無題記不能確定是否是宮廷寫經，暫未列入。此外，上圖 32 (812438)《法華經》卷二也是宮廷寫經。參趙和平《唐代咸亨至儀鳳中的長安宮廷寫經》，收錄於增勤編《首屆長安佛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五冊；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3 冊，第 319-337 頁；同氏《俄藏三件敦煌宮廷寫經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53-156 頁。

<sup>14</sup>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74 頁；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第 142-143 頁；林聰明《從敦煌文書看佛教徒的造經祈福》，收錄於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第 521-538 頁；方廣錫《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39-145 頁；杜斗城、吳通《敦煌遺書中隋獨孤皇后施造“一切經”及有關問題》，《蘭州大

秘笈羽 763《大般涅槃經卷一六、一七》也應是獨孤皇后寫經。此 7 件寫經題記大多只題“皇后為法界眾生造一切經流通供養”，從題記看個人色彩比較濃厚。不過浙 29 題有“秘書省寫”，則彰顯了這批寫經的官方屬性。隋煬帝時期的宮廷寫經目前僅發現一件，即羽 621《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該件題“大業四年四月廿五日經生郭英寫，用紙廿七張，禪定道場沙門校，裝潢人，秘書省寫”，“秘書省寫”顯示出該件乃是宮廷寫經。

私人攜入敦煌的佛教典籍，一是敦煌籍官員攜經返鄉。如中村不折 173 二卷之 5《觀世音經》題記載：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壹日清信士張萬福並妻呂先從沙州行李至此，今於甘州併發心，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及身並妻息等，減割資糧抄寫《觀音經》一卷。願成就已後，受持轉讀。災影遠離，恒值福因，見存者永壽清安、亡者托生靜（淨）土，乘此願因，俱登正覺。

此件《觀世音經》乃敦煌張萬福夫婦出使至甘州後發心所寫，出現在沙州藏經洞，當是他們夫婦二人返鄉時攜回的。S. 3475《淨名經關中疏》中也提及該件本抄於虢州開元寺，後為敦煌索遊岩帶回敦煌並送給了普光寺尼普意。

有些經典則是遊學僧道帶來留下的。如 S. 524《勝鬘經疏》題記載：

一校竟。照法師疏。延昌四年（515）五月廿三日於京承明寺寫《勝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受所供養記。

此件可能就是高昌僧人從洛陽返程回高昌途徑敦煌時留下的。  
又如 S. 2048《攝論章疏》題記：

仁壽元年八月廿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  
寫《攝論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

說明是此卷雖然是在長安所寫，但抄寫者是敦煌寺院的沙彌，  
所以此件便可能是沙彌善藏從長安帶回的。

再如 S. 4378V《大悲啟請》、《佛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  
為比丘惠鑾於己未歲（899?）在江陵府大悲寺抄得。而據 S. 2566《佛  
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尾題可以得知，戊寅歲（918?）時惠鑾便  
已身在敦煌了。故 S. 4378V 之所以流傳至敦煌，當是惠鑾本人遊至  
敦煌隨身攜入。

官文書的傳入方式應該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權通過專使、使  
者或館驛傳遞到敦煌的。重要的官文書如 S. 11287Q《敕沙州刺史能  
昌仁牒》，是由中書省發送給沙州刺史能昌仁的，似乎應該是由專  
使送達。又如 P. 5538《于闐王尉遲輸羅天尊四年致沙洲大王舅曹元  
忠書》則是從于闐發至敦煌，遞呈給歸義軍節度使的國書，也應該  
由使者送達。這類官文書當初都應該是以原形態被帶往或發往敦煌  
的，《敕沙州刺史能昌仁牒》是中央王朝對敦煌實施行政管理的重要  
憑證，過期以後成為廢紙流散到了寺院，寺院利用其背面的空白  
抄寫其他文字或修補佛經之用。

普通的官文書和官員的信件應該是通過館驛傳遞到敦煌的<sup>15</sup>。  
如 P. 3936《甘州丈人與沙州女婿書》，是在甘州的丈人寫給旅居敦

<sup>15</sup> 長安至敦煌沿線驛站，參楊希義、唐莉芸《唐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間的館驛》，《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35-144頁。

煌的女婿的書信，這類書信應該是通過館驛傳遞的。

普通百姓的私人書信似乎只能靠商人或過路行旅捎帶到敦煌。如敦煌發現的數封粟特文信件（Or. 8212-120《肅州某商人與沙州弟依斯哈克等人信》、Or. 8212-179《老漢刺史與葉勒·阿勒迷失達幹信》等），都是寫給經商停留敦煌的粟特商人的。這類信件應該是通過粟特商旅攜帶到敦煌的。

以上討論表明，正是由於往來奔波在絲路之上的使者、驛丁、僧人、官員、商人和行旅，他們出於不同的目的而東來西往，客觀上完成了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敦煌古代文化的絢麗多彩，正是由於不斷得到東西文化滋養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文本交流只是古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口耳相傳在古代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那些東來西往的僧人、商人和使者等，在敦煌停留期間，也會將文化、知識、宗教傳播給敦煌。口耳相傳方式對敦煌和絲路文化交流的影響，同樣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還應該指出，敦煌與外地的文本交流是雙向的。敦煌並不僅僅是被動地接收東西方文化，而是東西文化的集散地和樞紐站。探討敦煌文本乃至敦煌文化對東西文化的影響，也同樣是值得我們花大氣力研究的問題。

附記：文中地圖示意圖和表格均由筆者繪製。

## 參考文獻

### 原始材料

- 《冊府元龜》一千卷，王欽若等編纂於 1005–1013 年。引用本：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 《廣弘明集》三十卷，道宣（596–667）編，《大正藏》編號 2103，第 52 冊。

### 東亞語研究

- 方廣錫《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39–145 頁。
- 王書慶、楊富學《敦煌佛教與禪宗研究論集》，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 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記〉與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69–83 頁。
-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
- 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1988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0–85 頁。
- 杜斗城、吳通《敦煌遺書中隋獨孤皇后施造“一切經”及有關問題》，《蘭州大學學報》2013 年第 5 期，第 8–14 頁。
- 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年。
- 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
-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敦煌學》第一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出版，1974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楊希義、唐莉芸《唐代絲綢之路東段長安至敦煌間的館驛》，《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35-144頁。

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談起》，《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15-25頁。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趙和平《俄藏三件敦煌宮廷寫經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3-156頁。

增勤編《首屆長安佛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三冊，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鄭阿財《敦煌本〈維摩義記〉抄寫年代及系統分析》，《佛光學報》新三卷·第二期，2017年，第1-40頁。